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聖經故事類圖書在華出版狀況（1999-2014）研究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Hou, Zhaoyang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7-06 13:06:53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402

圣经故事类图书在华 出版状况(1999—2014)研究*

侯朝阳

内容提要:自1999年以来,圣经故事类图书在中国非常流行,达60种之多。其出版发行呈现出三个主要特征:房龙的《圣经的故事》最为畅销,出现了30种译本,译房(龙)之风盛行;译者或改编者采取了极为灵活和富有特色的“本土化”策略;读者主要从历史而非信仰的价值立场和视角来理解、阐释圣经故事。圣经故事类图书在华出版热是八九十年代相关读物出版热潮的汇流,日后将会出现质量更优的新版本。

关键词:圣经故事;房龙;本土化

Analysis on Books of the Stories in the Bible Published in China 1999—2014

HOU Zhaoyang

Abstract: Books of the stories translated or adapted from the Bible are

* 本文为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跨文化视阈下的19世纪入华新教传教士汉语基督教文学研究”(14CZJ009)成果之一。

increasingly popular in China since 1999, and about 60 kinds have appeared. Van LOON's *The Story of the Bible* has gained huge success in China as it has 30 translation editions. Chinese scholars employ localization strategy when telling stories in Bible, changing the Bible from a text of foreign lands and full of unfamiliar features into a Chinese one in order to attracting most Chinese readers. And in most cases, translators and adapters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the Bible not with religious convictions but in historical ways. The surge in publishing books of the stories in the Bible may be taken as a follow-up trend of 1980s and 1990s. And there may appear much higher quality versions in the near future.

Key words: stories in the bible; Van LOON; localization

作为一部内容极为丰富的宗教文化典籍,圣经在以往百年间曾以多种形式在中国流传。概而言之,其传播途径约有四端:其一,直接翻译。当下汉语学界流传大约十种译本,其中尤以1919年首版的官话和合本最为知名;其二,由文艺家以故事新编的形式改造而成,甚至借助新媒介传播的作品,如鲁迅的《野草·复仇》、茅盾的《耶稣之死》、端木蕻良的《复活》,以及各种相关的(包括从国外引进的)影视作品;其三,由学人撰写和翻译的各种圣经介绍类、解读类书籍;其四,新近出现的出版圣经故事类图书的热潮。学界对前三种传播方式关注得较多,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而对后一种情况则关注较少。本文主要探究近15年来圣经故事类图书在华出版状况,以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一、译房(龙)之风盛行

译房(龙)之风盛行是近15年来圣经故事类图书出版发行最为明显的

特征。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以来,此类著作或译作多达60余种,且呈现出版本多、印制量大的特点。该书的出版盛况远非一般书籍可以比拟,几乎各大出版社皆有发行。其中翻译(含编译)约占三分之二,尤以房龙《圣经的故事》最为畅销,出现了至少30种译本,出版频次亦遥遥领先。现将该书的相关信息汇总如下:

表一:房龙《圣经的故事》汉译出版情况一览表(1999—2014)

出版年份	译者	出版社	首印(册)	其他信息
1999	雷菊霞、博文	北京出版社		2002年第3次印刷,总量至2万册;2004年重印;2011年推出新版,收入“典藏房龙”丛书
1999	李申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房龙故事丛书”之一
2000	乔菲、刘学政	北京燕山出版社		重印:2001年、2002年、2005年(2版)、2006年、2007年(3版)、2010年、2011年
2001	张稷	河北教育出版社		“房龙的书”(12卷)系列之一,2004、2005年重印;2010年在鹭江出版社、2013年在中华书局出版
2002	王伟、刘国鹏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5000	收入“发现世界丛书”(凡32册,房龙6册),当年10月再印0.5万册,2007年、2010年再印,插入168幅名画和255种博物馆馆藏艺术品
2004	李胜愚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圣经故事插图本》,收入“十元本随身书库”
2004	周英富	东方出版社	5000	2005年重印
2004	王锐、王阳光	大象出版社		2008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重庆出版社再版
2006	张蕾芳、王立新	人民文学出版社	1万	收入“20世纪外国名家精品”丛书
2006	丁朝阳编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房龙作品阅读系列”(9卷本)之一
2006	秦立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英双语本;2008年第4次重印
2008	刘乃亚、纪飞编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喻天舒、杨海若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英汉对照本
2008	晏榕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0年光明日报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9	戴欢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1	谢炳文	译林出版社	1939年世界书局发行本重印
2011	黄悦	北京三联书店	
2011	程庆华、黄厚文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	孟陶宁主编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2	和彩霞	武汉出版社	配以300多幅世界名画和文物照片
2012	徐昌强	中国城市出版社	英汉对照
2012	梁志坚、黄婷婷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2	田然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	冯道如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	肖遥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2	逸凡	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2	光明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圣经故事(全译插图典藏版),收入“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2012	王强春改编	天地出版社	《听房龙讲圣经故事》,“听大师讲经典”
2013	朱振武等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庆学先	安徽文艺出版社	收入“理想图文藏书·房龙作品”

如上表所示,除了谢炳文译本为旧版重印外,房龙《圣经的故事》的其他译本均为新近译作,且常常一版再版,多次重印,出版数量极为可观。为何译房(龙)之风如此强劲?究其因,概有两点:

其一,这是80年代房龙风刮进中国后形成巨大声势的余响。房龙的《宽容》一书于1985年9月由汪卫、靳翠微翻译,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首印7200册,“七个月后第二次印刷,猛增至五万余册”。^①时至1987年2月第4

^① 见网站:http://reader.gmw.cn/2011-05/28/content_2019065.htm

次印刷时出版总量已达25.88万册。其后,包括《宽容》在内的房龙系列作品开始热销。“至1998年,此书连续印刷11次,成为三联书店评选的‘二十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百本图书’之一。紧随其后,他的《人类的故事》和《漫话圣经》也热闹上市,掀起了难得一见的‘房龙热’”^①。《宽容》一书甚至被认为“一度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启蒙时代知识界人手一册的精神福音”^②。房龙也因此被贴上“启蒙思想家”的标签。2001年12月6日《中国教育报》刊文称:“在各出版社推出的众多房龙作品译本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北京出版社分别于1999年和2001年出版的两批共14册(收入17种著作)的《房龙文集》,这两批书将房龙一生的著书都囊括在内……”^③可见房龙为中国读者奉上了“人文主义的盛宴”。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房龙《圣经的故事》开始走俏,有至少5种译本被收入房龙书系,同房龙的其他作品一道出版,加之出版社的精心策划,译房(龙)之风几乎势不可挡。

其二,房龙所讲故事通俗易懂、明白晓畅,更重要的是,他评价重大思想史事件及思想家时秉持了理性态度和宽容立场。房龙认为,对圣经的理解须破除“迷信”而追踪真实的历史,表现出人类的理性和宽容精神,由此他将耶稣描述为一个具有崇高道德感的悲剧英雄,完全过滤掉了他所行施的神迹奇事。这一立场同受过无神论教育的中国读者在知识结构和道德诉求方面有着内在的契合,尤其同中国刚走出“文革”阴霾后呼吁理性精神的思想氛围相适应。诸多译者和学者对房龙的评价能证明这一点。如王伟在《译后记》中说:房龙“虽是以圣经为蓝本讲故事,却不拘泥于原典,而是将所谓的神迹、民族传说、历史故事与近代以来的历史、考古发现相观照,以一种客观、冷静的视野探本溯源,让你时时感觉到那种摒弃无知、偏

① 房龙:《宽容·房龙小引》,连卫、靳翠微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页。

② 房龙:《圣经的故事》,王伟、刘国鹏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73页。

③ 转引自丁朝阳:《房龙讲述圣经的故事·附录》,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

执,倡导宽容、善良的健全理性。”^①“80年代,房龙的主要作品重译出版,其中包括列入三联版文化史译著系列的《圣经的故事》,在读书界引起对房龙的‘重新发现’。那个时候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没读过房龙的书而被人发现,会是很没面子的事”^②。这里所谓的“没面子”,也能视为被贴上不够“宽容”的标签。钱满素在《致读者》中表示,应该赞扬房龙关于民主、理性和宽容的主张,他“决不是西方中心论者”,应该像他那样“向无知与偏执挑战”。^③

笔者也注意到,房龙及其《圣经的故事》最近亦遭致一些质疑,认为其研究不够严谨,过于主观随意,歪曲了圣经文本的原初意义。如王立新一方面肯定其价值在于“通俗易懂地向人们讲述着关于人类历史的进程……捍卫人性的尊严和权利……呼唤理性和宽容精神”,同时也指出“正如房龙同时代的学院派学者对他诟病的那样,由于作品中强烈的主观色彩和对历史细节准确性的忽视,他并不能被称作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正如当代读者从他的作品中所感受到的那样,他也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具有独特思想体系的思想家”。^④更有学者认为房龙的研究态度存在问题。“房龙去掉了几乎所有的神迹奇事,这是对圣经最大的和极其随意的篡改……比如马利亚的圣灵感孕,房龙不仅只字不提原始记载,反而篡改圣经,说马利亚去见以利沙伯之前没有怀孕,回来后和约瑟结婚才怀了孕。‘旷野试探’则完全删掉了。再如保罗在去大马色路上的奇妙归正,也被浓缩成一句‘保罗走在路上,忽然就醒悟了’。这已不是一种改写,而是欠缺了最基本的诚实”。^⑤

① 房龙:《圣经的故事》,王伟、刘国鹏译,第273页。

② 同上。

③ 钱满素:《圣经的故事·致读者》,收于房龙:《圣经的故事》,雷菊霞、博文译,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页。

④ 房龙:《圣经的故事·前言》,张蕾芳、王立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6页。

⑤ (英)G. 英沃森夫人:《圣经里的故事·序一》,陈凤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在该学者看来,圣经是“心灵之书”,应以虔诚和敬畏之心去聆听“灵性的声音”。

二、“本土化”的改编策略

据不完全统计,近15年来,国内学者直接参照圣经文本改编的圣经故事有20余部,具体出版信息如下。

表二:中国学者编(著)圣经故事类图书一览表(1999—2014)

出版年份	书名	编著者	出版社	其他信息
2000	《圣经故事·上册·旧约》	廖诗忠编著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0	《圣经故事》	李华平编译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0	《走向神圣:耶稣传》	孙善玲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首印5000册
2000	《圣经故事全编》	施正康等编译	学林出版社	2000年首印5000册,2001年再印3000册,2009年重印
2001	《圣经故事·插图本》	支点文化工作室编写	四川文艺出版社	4月出版,6月重印
2002	《耶稣》	金辉著	团结出版社	首印5000册
2002	《圣经的故事》	张文竹、张竞之改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3次再版,编入“世界文学名著宝库·青少年版”
2003	《圣经故事(插图本)》	刘小江	人民文学出版社	配有240幅木刻画
2003	《漫话圣经》	余日昌、叶青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首印8000册
2003	《圣经的故事》	王幸编译	时事出版社	27章,以《旧约》为主
2005	《圣经故事新编》	王忠祥、贺秋芙编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年再版,世界文学经典文库(青少年版)

2005	《人一生要知道的 100个圣经故事》	黄未未	中国戏剧出版社	近300幅插图,编入 “彩色图书之旅” 丛书
2007	《图说圣经故事》	马荣道	宗教文化出版社	首印12000册
2007	《圣经文画:一条穿 越西方艺术之林 的小路》	舒艳红	学林出版社	
2008	《圣经故事·名画全 彩版》	洪佩奇、洪叶 编著	译林出版社	
2008	《图解圣经故事· 旧约》	傅宏基编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知识性强、插有图示
2008	《圣经故事(英汉对 照)》	刘意青等选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 公司	该书是对圣经的直 译,选取100个故事
2008	《圣经故事》	段琦	译林出版社	2010年再版
2009	《书中之书·艺术中 的圣经故事》	陆宏齐主编、 程鹿峰编译	中国时代经济出 版社	
2010	《圣经故事赏析》	董晓波等	对外经贸大学出 版社	“面向广大中学生和 大学低年级学生”
2011	《圣经故事名篇 译注》	刘意青、李小 鹿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1	《圣经故事大全集》	王峥嵘编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配图100余幅

上表所列的22部圣经故事几乎全都配有插图,从中可看出编著者针对不同读者层次的市场考量。毕竟,对大部分读者而言,圣经文本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直接阅读圣经会面临很大挑战。若配以形象直观的插图来点缀并解说故事,理解文本的难度就会大大降低。可见不能将编著者这种策略简单地理解为迎合以追求快餐化、休闲化、娱乐化为主要特征的“消费文化”行为,而应充分认识、肯定他们以“本土化”方式吸纳外来文化的意图和努力。

对于基督信仰入华后如何融入本土的传统和文化,学者们使用了“本色化”、“本土化”、“处境化”等多个术语去界定,且为此争议不断。虽然概念不同,实质却是一致的,都意指被视为外来文化的基督教信仰为适应中

国文化而采用的生存策略;这已日渐成为学界的共识。如文庸所说:“我们认为‘本色化’、‘本土化’、‘处境化’等都是同义词。”^①段琦指出:“实际上人们在进行‘处境化’研究时,很少考虑到它与‘本色化’之间的区别,因此也许可以把它视为‘本色化’在当今的替代物。”^②对于圣经传播者而言,不论是翻译还是依圣经来编写故事,都是对圣经文本的重新阐释,在此过程中,编译者必然要考虑所使用语言及阅读受众问题。而对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圣经毕竟是具有异域色彩的陌生读本,以致中国学者在编写圣经故事时极尽其可能地实行了“本土化”的叙述方式。其“本土化”策略除了上面提到的图文并茂式呈现圣经故事外,还表现为在保持圣经原意的基础上加入中国文化元素,为满足国人的精神需要而对圣经加以适当改造。

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马荣道编著的《图说圣经故事》,它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因素,采用了近于宋元话本特点的表达方式,并在每页文字下方配以相应的白描画。试举一例:“此后,耶稣就往各城各乡去做游行布道的工作。可惜人们竟不肯悔改,耶稣就为他们祷告,又恳切地教训他们说:‘凡劳苦担负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诸位!耶稣说这重担,并不是负着重东西,乃是指人的罪恶很多,终日被罪压制了、捆绑了,这样比担重担还要痛苦呢!幸亏有耶稣凭着爱心一再地招呼我们到他面前,好叫我们得脱去那罪的重担,我们不要失去这机会呀!”^③其间明显包含着“说话人”试图唤起听者兴趣、希冀其产生共鸣的努力,具有极强的现场感。书中比比皆是的“话说”、“再说”、“那时”、“当时”、“一日”、“又一日”等词,更是“说话人”为营造画面感、增强故事性而常用之副词。该书的白描插图也别有意味。每幅插图必包含三部分:图画、文字说明和相关经文出处。作为整体,它们既与插图外的故事讲述在意义上相切合,又因自身

① 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页。

② 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58页。

③ 马荣道:《图说圣经故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66页。

带有简短的说明文字而自成一体;而且,经文出处的标注非常类似于作画者的签名。细究画面,无论是人物、衣饰、实物、房舍店铺,皆类似于宋人生活场景,且制作非常精细。譬如,耶稣和他的门徒都头戴方巾、衣着简朴,法利赛人则披戴冠冕、衣饰华丽;二者身份地位的高下之分一见便可通晓。

王忠祥、贺秋芙编著的《圣经故事新编》也明显带有传统文化的印迹,这一点通过各篇章的题名即可看出。如“开天辟地创万物 亚当夏娃失乐园”、“该隐杀弟受诅咒 洪水滔滔漂方舟”、“以扫出卖长子权 雅各冒名获鸿福”、“英雄难过美人关 高歌悲壮参孙亡”等,^①这类标题显然受到明清章回体小说的影响。

三、非信仰的价值立场和视角

除了采取极为灵活和富有特色的“本土化”策略,近年来在华出版的圣经故事类图书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从历史视角而非信仰立场来理解、阐释圣经故事。房龙《圣经的故事》在中国之所以能大为盛行,与译者乃至大部分接受者的这一立场有关。这种立场甚至成为中国学者编写圣经故事的一种默契,尤其体现在作者试图廓清“历史的耶稣”的倾向中。譬如,文庸认为:

从历史资料出发不涉及信仰地研究历史上的耶稣,试图从理性思维的角度来探索耶稣的本来面貌,这类研究著作在国外虽早已硕果累累,在国内却几乎还是一块空白。近十年来,我在国内一些高等院校里向同学们介绍基督教文化时,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耶稣其人”。在教学中,我一直试图对《福音书》中耶稣的言行寻求一种合乎一般逻辑

^① 王忠祥、贺秋芙:《圣经故事新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

辑的解释,对一些只有从信仰出发才能理解与接受的内容则尽力回避或不作解释。据反映,这种作法既没有伤害信徒们的宗教感情,又使非信徒大体上能够接受或至少能够听得下去。本书的目的就是想在在这方面做一点尝试。^①

所以,“我不想走‘从信仰到信仰’的老路”,而是要“把信仰中的基督复原为历史的‘人间的耶稣’”。^②文庸这些话虽是讲于1994年,却代表着圣经故事类作者的共同心声。

孙善玲在《走向神圣:耶稣传》一书的前言中说,该书“是作者尝试以当代中国人的观点和情趣书写耶稣基督的结果。作者缺乏信仰的实践和神学的训练,只能从历史的角度探索耶稣其人其事的存在和意义”^③。作者意识到了区分历史的耶稣和信仰的基督的困难,“只想以中国人的感情去认识耶稣,以中国人的方式思考‘耶稣为什么是基督’这个既古老又永远新鲜的问题”^④。故而在解释耶稣治病赶鬼等神迹奇事时,孙善玲指出,这是《福音书》作者为了证明耶稣是基督而提供的证据,且是古代多个民族的共性思维模式:“在古代人看来,人生病是因为行为不端而遭到神的惩罚;同时,许多疾病都是鬼或邪灵进入人体内作祟的结果,这使降神驱鬼成为治病的一种重要手段,这不仅是以色列人也是其他很多民族包括中国人的认识。”^⑤“他们使用的是那个时代的特定解释方式。按我们今天所受到的教育和科学的普通知识,不可能认同这些超自然神迹。然而,我们在读福音书时,仍强烈地感受到耶稣济世救人的伟大胸怀。作为一位伟大的宗教领袖,每到一处,耶稣总是用慈悲和怜悯之心去治愈人们心理上和生理上的

① 文庸:《人间的耶稣·自序》,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2页。

② 同上。

③ 孙善玲:《走向神圣:耶稣传·前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④ 同上。

⑤ 孙善玲:《走向神圣:耶稣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10页。

病痛创伤,赢得人们的信仰。基督教继承了这一传统,治病救人成为传教工作的重要方式和内容。”^①就这样,耶稣基督的神性被消解了,他成为仁爱道德的典范,中国式圣人的化身。在孙善玲看来,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文化有倡导‘仁爱’的悠久传统,能充分理解、吸收耶稣的爱的教导”^②。孙善玲还注意到,从历史的角度“直探耶稣”,已成为中国人阅读圣经和了解基督教的主要方式^③。

其间反映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圣经吸引这些中国学者的地方,不在于信仰而在于伦理训导、道德教诲、“圣人”理想。焦庸鉴在《译后记》中表达了他从事《圣经故事》翻译的内在动机:“将信仰上帝这一层放下不论,将基督耶稣那无边的法力这一层放下不论,《圣经故事》里一再形象地讲述的那些道理,以仁爱之心待人,以宽恕之道容人,以睿智和敏锐察人,以坚定的信念百折不挠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世道多么需要的品质啊。”^④可见当代学人援引圣经故事意在召唤中国文化传统回归,这一态度是非常普遍的。

近十五年来圣经故事类读物在华出版的热潮与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的同步,体现了国人视圣经为认识西方文化的核心典籍,并要通过这个窗口理解西方的文化。就当下现状而言,编著者“处境化”的改写策略及其对非信仰价值立场的坚守,已经卓有成效地将圣经故事类图书推向市场,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之间搭建起一座对话的桥梁。这一方面引发和满足了民众对基督教文化、历史和神学的兴趣,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祛除人们对基督教是“鸦片”或“迷信”的偏见;另一方面,

① 孙善玲:《走向神圣:耶稣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11页。

② 同上,第132页。

③ 同上,第245页。

④ [奥]福森奈格:《圣经故事》,焦庸鉴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第382页。

也有可能使一部分读者从好感走近信仰,进而通过更深层次的阅读,以致无论置身于信仰内外,都可以生活得平静而安宁。

(陈会亮 编)

作者侯朝阳,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在站博士后,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圣经文学研究,近期发表论文《沉默的言说者:论〈宗教大法官〉中的耶稣基督形象》等。